

中国书法系列丛书

郭恒 编著

北京体育学院出版社

石鼓文的辨识与写法



石鼓文的辨识与写法

郭 恒 编著

北京体育学院出版社

〔京〕新登字146号

责任编辑 杨再春

责任校对 刘 牧

封面设计 蒋 悦

石鼓文的辨识与写法

郭恒 编著

北京体育学院出版社出版发行
(北京西郊圆明园东路)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国防科工委印刷厂印刷

开本: 787×1092毫米1/32 印张: 5 定价: 3.00元(压膜装)

1991年6月第2版 1991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: 15000册

ISBN7-81003-203-8/J·71

(凡购买本版图书因装订质量不合格本社发行部负责调换)

作者简介



郭 恒 (字长城, 笔名苏原, 印名秦石, 号麓、厠石翁, 斋馆: 蚕烛斋。)1934年2月生, 秦·蒲城人, 毕业于西安美术学院国画系, 善书印, 善词赋, 好绘画, 长于文艺理论。中国书法家协会、中华诗词学会、中国硬笔书法家协会会员, 兼《书法》、《书法研究》、《文艺报》特邀通讯员, 曹州书画院名誉院长。创办《青少年书法报》(历任副总编)、全国神龙杯书法赛(历任评委)、全国青少年书法品评活动(历任评委)、东方高等书法艺术学校(历任业务校长)。

著有《中国书法史·唐前部分》、《古印赏析》、《书法与姊妹艺术》及《石鼓文的辨识与写法》。论文入选于全国三届书学讨论会、国

际首届汉碑学术讨论会及《中国书法鉴赏大辞典》、《古今闲章艺术鉴赏集览》，获黑龙江省论文一等奖。书法、篆刻、绘画作品发表于日本、南朝鲜、台湾、澳门及国内各专业与新闻报纸，刊石于黄河、神墨、翰园等碑林。传略收入《中国现代书法家辞典》、《当代书画篆刻家辞典》、《当代文学、艺术新闻人才传集》等辞书。

目 录

石鼓与石鼓文·····	(1)
石鼓的发现及其迁徙·····	(4)
石鼓文的凿刻年代·····	(9)
石鼓文内容释译·····	(13)
石鼓文拓本·····	(32)
石鼓文的辨识·····	(38)
石鼓文的书写·····	(63)
石鼓文哺育的子孙·····	(76)
石鼓歌——石鼓书学之奇葩·····	(82)
郭沫若释石鼓文·····	(87)
附图·····	(96)
插图·····	(143)
郭恒临石鼓文 (局部) ·····	(152)

石鼓与石鼓文

“石鼓”既为中国第一古物，亦当为书法家第一法则也。

——康有为

石鼓，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文字刻石。是用十块石质坚硬的青黑色花岗岩雕凿成上狭下大、顶圆底平，直径约一尺余、高约二尺多，型似鼓的雕刻物，所以后人起名为石鼓。石鼓又有许多别名，因其围镌刻着记叙先秦臣君游猎的故事，所以又有“猎碣”之称。碣，何意？汉代许慎《说文解字》中说：“碣，特立之石”。碑，也是特立之石，因此，碑与碣的意义相同。《五篇》中说：“碑，卧石也。”《后汉书·窦宪传》亦云：“方者谓之碑；圉者谓之碣。”由此看来，把石鼓称为“猎碣”是比较恰当的。唐代窦蒙说：“岐山雍城南，有周宣王《猎碣》十枚，并作鼓形，上有篆文；

今见打本。称石鼓为《猎碣》者，大概自窦蒙始。因为石鼓文辞中有“汧”（音牵）字，石鼓又发见于岐阳，所以又称石鼓为“汧阳刻石”。汧，即汧源，地名，秦襄公都府，在秦雍地，所以又称为“秦雍邑刻石”。邑，城都也。那么，又为什么称石鼓为“陈仓刻石”呢？这是因为石鼓的发现地是唐代的陈仓县，即后来的三时源。唐代书法理论家张怀瓘在他的著作《书断》中说：“籀文者周太史籀之所作也，与古文小异，后人以名称书，谓之籀文。……其迹有《石鼓文》存焉。盖叙（周）宣王畋猎之所作，今在陈仓县。”所以唐以后人又称石鼓为“陈仓石鼓”或“陈仓刻石”。值得注意的是，“石鼓文”“籀文”的命名，大概自张怀瓘开始。

石鼓，又有新旧之分。清代乾隆十五年，高宗令其部下将原石鼓设立重栏加以保护，以示珍重。并选十石雕作鼓状，在上面摹刻了原石鼓的诗文，允人随意椎拓，以广泛流传，从此，石鼓就有了新旧两种，并均置于国子监。后人称原石鼓为旧石鼓；摹刻的石鼓为新石鼓。

此外，石鼓文还有缩刻、木刻等多种，仅阮元就摹刻了十次之多。虽然使石鼓文得以广泛流传，然精神气质、神彩、意韵却相去远矣。（附图一：石鼓）

石鼓文，指这十个石鼓上所镌刻的诗辞文字，有

文学、文字、书法等方面的内容，主要包括诗辞的体裁与内容，大篆的形制与音训；石鼓书法的艺术特色等。石鼓文诗辞的体裁，是先秦时流传的一种习惯文体，仿效《诗》的体裁，而又不同于《诗》；近似《周颂》，而又不见明显的祈福之辞。是采用《诗》的语言风格，赋于追颂先德、光跃本原的新型纪事作品。概括这十篇诗辞的内容，即整治道途，游玩渔猎。石鼓文文字的形制，既不同商周时代青铜铭文，也不同《泰山刻石》等秦始皇出游时刻石的文字形制，而是介于二者之间又非常靠近秦篆的，带有中国汉字演进过程中的阶段性形制。石鼓文的书法，无疑属于中国汉字书法中古文字书法系列中的一种，是篆书体系中大篆的一种：《散氏盘》《虢季子白盘》等为其母体，又生下了秦篆、汉篆的子孙。（见附图十二）

石鼓的发现及其迁徙

石鼓不见称于前代，自唐始出于岐阳，……

——宋·郑樵

石鼓的发现，唐以前不见记载。

唐初，于天兴县（后为陈仓县，今陕西省凤翔县）南二十里处的田畴原发见。苏勗说：“世咸言笔迹存焉，李斯最古，不知史籀之迹，近在关中。”唐·李嗣真说：“史籀湮没，陈仓籍甚。”李吉甫亦云：“石鼓文在县南二十里许，石形如鼓，其数有十……。”贞观中，吏部侍郎苏勗记其事云：“世言笔迹存者，李斯最古，不知史籀之迹，近在关中，虞、褚、欧阳，共称古妙。虽岁久讹缺，遗迹尚有可观。而历代纪地理志者，不存记录，尤可叹息。”李吉甫文中的“贞观中”即唐太宗李世民在位时期（贞观，李世民之年号），公元627年至644年间。

石鼓发现以后，尤其是唐代当时的大诗人韩愈、杜甫、韦应物作《石鼓歌》以后，石鼓才真正大显于世，考古家、文学家、词赋家、诗人、史学家、文字学家、书法家们珍重者，日益巨增；直至今天，人们不仅视其为国宝而特别加以保护，而且引以为民族的自豪。

石鼓自唐初发现以后，因战乱抢夺，天灾人祸等等原因，东西南北，屡屡迁徙。其迁徙经过，大致如下。

宋代郑樵《石鼓音·序》中说：

石鼓不见称于前代，至唐始出于岐阳，先时散弃于野，郑余庆取置于凤翔之夫子庙。经五代之乱又散失。宋司马池复摯置府学之门庑下。而亡其一。皇佑四年向传师求于民间而获之，十鼓于是乎足。……大观中置于辟雍，后复取入保和殿。经靖康之变，未知其迁徙否？

这段话是说，唐朝元和十五年，即唐宪宗李纯在位的公元821年，郑余庆把石鼓移到凤翔府孔庙里。五代变乱中又失散了。宋代的司马池找到了九个，安放在府学门廊下。公元1052年（即皇祐四年），向传师去民间探访，找到了丢失的那个石鼓，可是上面已经

凿成米臼了。北宋梅尧臣有诗佐证向传师完鼓会全的情况：“传至我朝一鼓亡，九鼓缺剥文失行。近人偶见安碓床，亡鼓作臼剝中央。心喜遗篆犹在傍，以臼易‘臼’庸何伤。以石补空恐舂梁，神物会合居一方。”公元1107年（即“大观”中）将石鼓从陕西凤翔迁到汴京（今河南开封市，当时北宋的京都），放置在辟雍，后搬入保和殿。南宋以前，石鼓的迁徙大致如此。

金人入侵，占据了汴京（即“清康之变”。“清康”是宋钦宗赵桓的年号），以后，石鼓的迁徙情况怎样呢？作为宋代人的郑樵，当然“未知其迁徙否？”请看之代虞集《石鼓序略》 中有一段叙述：

大都国子监文庙，石鼓十枚，其一已无字，令渐漫灭。其一不知何人凿为臼，而字却稍完。此鼓据传闻，徽宗时止京北移置汴梁，贵重之，以黄金实其字。金人得汴梁奇玩，悉辇之燕京，不知（石鼓）为何物？但见其以金涂字，必贵物也。亦在北徙之列，置之王宣抚家。王宣抚宅后为大兴府学。大德之末，集为大都教授，得此鼓于泥土草莱之中，洗刷扶植，足十鼓之数。后助教成均言于时宰，得兵部差大车十乘载之，置于今

国子学大成殿门内，左右壁下各五枚，为砖坛以承之，为疏櫺而扁鐫之。……大抵石刻而高，略似鼓耳，不尽如鼓也。’

虞集的叙述，正好接续宋·郑樵之说，将石鼓至靖康之变以后的迁徙状况补叙得十分清楚。金人抢走石鼓以后，见字以金填着，认为是极珍贵的东西，就将石鼓运到了北京（即“燕京”），剔出填金，放置到王宣抚家园。元代成宗铁木耳末年（约公元1306年）置于大都路学。到元仁宗爱育力拔力八达（年号皇庆）的时期（约公元1312年），又用大车把石鼓拉放在国子监大成殿门左右，一边五个，下边用砖坛托围着，四周设栏杆保护。

到了清代，乾隆十五年（公元1750年），高宗弘历命部下设重栏保护，并另选石镌刻了新石鼓。新石鼓也置于国子监。

民国二十二年（公元1933年），这些在北京存放了五、六百年的石鼓，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，当时以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先生为首的爱国志士，怕石鼓被毁没，便多方加以保护。后来又将石鼓南迁运往上海。解放后，于1958年又将石鼓复归北京，陈列在故宫博物院的归箭亭内。

以上就是石鼓自发现以来，历经宋元明清及近代

近两千年间，石鼓迁徙、保护的大致经历。从这里可以看出，我们的祖先，不论哪个民族，是何等的珍视，保护石鼓这组文物国宝。时至今天，乃至我们的子子孙孙，又应如何去做呢？

石鼓文的凿刻年代

观此十篇，皆是秦篆。……石鼓固秦文也。

——宋·郑樵

石鼓的凿刻年代，历来不得而知；就其凿刻的时代而言，历来也说法不一。唐代张怀瓘、韩愈认为是周宣王时物；韦应物认为是周文王时凿石，周宣王时刻字；宋代董道、程大昌以为是周成王时物；郑樵则以为是秦时之物；金人马定国以为宇文周时；清朝武亿定为汉人所制；俞正燮以为是北魏太平真君时。……近代自王国维始，考古家、文字学家郭沫若、马衡、唐兰等，一致确认石鼓是先秦时的刻石，尤其是唐兰先生的考证，进一步判定为秦献公十一年（公元前374年）。可谓众说纷纭，莫衷一时。

到底石鼓文为何年凿刻？确切年代，尚难定论，只有通过多方面的考察，方能从中得出比较接近的

答案。

第一，从内容看，司马迁《史记·秦本记》记载，《而师》篇是叙须秦惠文王三年（公元335年）王冠天事致文武胙肉事，因此，石鼓文最早刻成年代应为秦惠文王三至十三年，即公元前335年至前325年。

第二，从石鼓文诗辞的体裁看，为叙事诗，是关于游猎、业绩的颂辞，这种形式，没有客观的现实生活素材，是写不成的。而秦惠文王三年，正是第一个膺嗣王位之年。另外，石鼓文诗辞十篇中，竟没有一个叠句，当然不属于《诗》的时代，因为《诗》的赓和叠句约占百分之七十；似乎近于《周颂》，但又不见《周颂》那种明显的祈福之辞，正于先秦时流行的习惯文体——《诗》的语言风格，赋予新的纪事内容，完全相和（从始皇帝巡游刻辞内容中略见一斑）。

第三，从石鼓专家、考古家的考证来看，自宋代郑樵认为秦物之后，后来专家多定为秦物，尤其是王国维、马衡、郭沫若、唐兰等（马衡的《石鼓文为秦刻石考》；郭沫若的《石鼓文研究》）先生的研究成果公布以后，石鼓文为先秦时物，人们已无疑义。马衡定为是秦穆公始霸西戎，天子致贺时所作（公元前659年至前621年）；震钧的《石鼓文集注》定为秦文公东猎时作（公元前736年）；郭沫若定为秦襄公八年

（公元前770年）立西畴时所作；唐兰定为秦灵公三年（公元前422年），后来又改为秦献公十一年（公元前374年）；郑质清在《石鼓文试读》中又确认为秦惠文王三年以后；……以上诸说，各执其据，各论其理，对石鼓凿制的具体年代，到目前为至，尚无确定，还有待日后实物的发掘，史料的充盈，指望有一个铁的证据出现，才能平息关于石鼓凿刻年代的持久论战。

第四，从文字的形制来看，石鼓文介于金文与小篆之间，既不同于东周的青铜铭文，又不同于秦始皇“书同文字”的秦篆，似觉从《虢季子白盘》等这些母体中出来，又是尚未定型化、规范化的小篆。因此，视其为秦始皇统一文字之前，但又十分靠近时期的刻石，当为合理。尤其是近年来《秦公簋》及《秦公钟》几件文物的出土，进一步从书体上证明了石鼓文为先秦时物。

总之，石鼓文的凿刻年代，自唐迄今，凡数十种专著及诸多散论，都作了独到的论证，如欧阳修设三疑，郑樵视秦物……归结起来，大致有五说：周、秦、汉、后魏、北周等五个时代。古人向来以周说占优势，现代人则盛行于秦说。论争了一千多年，直至解放后，才取得了比较一致的看法——定为东周初年（公元前